

清理“三种人” 消除大隐患

本刊评论员

“三种人”是搞“文革”起家的“乱世英雄”，他们在“文革”中逞雄称霸，江青反革命集团，拉帮结派，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挑动武斗，制造冤案，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创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还明里暗里向党、同人民作对。其中一些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藐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大搞分裂，继续中伤领导同志，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夺回他们失去的“擎天下”。本刊这一期所披露的所谓“三种人”、“四人帮”残余势力，即“三种人”为骨干的“中华民族联合阵线”反党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一个例证。

这个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采取秘密串联的方式，网罗死党和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诡秘，令人发指！他们散布大量反革命言论，阴谋制造反革命事件，收买恶人之心。他们策划劫枪支弹药，搞“暴乱”，搞“大震”，并狂妄地叫嚣：“要把江青弄出来搞革命”，“彻底推翻”现政权，建立新政权。反革命气焰何其嚣张！

这个“中华民族联合阵线”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的闹剧，就足以说明“三种人”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是党内最不安定、最危险的因素。因此，全面否定“文革”，彻底清理“三种人”，就成了这次整党、纯洁党的队伍的关键。不肃清“三种人”，他们就会在适当时机重新跳出来，为敌作歹，阻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肃清“三种人”，就不能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削弱党的战斗力；不肃清“三种人”，就难以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难以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我们放松警惕，让“三种人”混进“第三梯队”，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就会隐患无穷。

薄一波同志最近强调指出，在清理“三种人”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各级党委要切实抓紧清理“三种人”这件关系重大的工作，充分利用当前政治上的大好形势，克服非议干扰，克服软弱无力现象，冲破各种阻力，有重点、分步骤地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三种人”彻底清理出来，以确保整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昔日“文革”英雄 今日阶下囚徒

我省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本刊通讯员张连兴

本刊记者 王国民

最近，我省破获了以“四人帮”残余分子为首，即以“三种人”为主要成员的重大反革命集团“中华人民联合阵线”。这个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采取秘密串联的方式，网罗“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和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鼓吹和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恶毒诽谤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制定他们的纲领、国策，策划筹集活动经费，秘密印发反革命传单，密谋策划搞文抄经，妄图“亮牌子”、“搞大联动”，搞“要把江青弄出来领导干”，“彻底推翻”现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革命气焰嚣张云云。

是什么在惊心，惊涛骇浪的大案，清楚地告诉我们：“三种人”是一群害国害民的政治势力，是党内最不安定、最危险的因素。不把他们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下，必然会留下可怕的隐患。

今年七月，周口、洛阳、平顶山地、市中区人民法院先后召开宣

判大会，判处以张三益为首的“中华人民联合阵线”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八名罪犯一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有力地打击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一、“三种人”确实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

被判刑的十八名罪犯中，“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就有十三人，其中有原县级党员干部六人。首犯张三益，原周口地区邮电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革”中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得到赏识，由机要员提拔为局领导。七七年因奸污妇女被免职，开除党籍，主犯李济川“文革”中国造反有功，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地委委员、县委第一书记。一九七八年因“文革”中错误严重被免职，主犯王廷彦、韩振文因造反得力都被提拔当过县委副书记，主犯任廷庚在“文革”中曾任河南最大的造反组织“二七公社”作战部部长、郑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临汝县委常委。主犯邵连庆，曾任“二七公社”周口市蔬菜队服务员。上述几名主

清理“三种人” 消除大隐患

本刊评论员

“三种人”是借“文革”起家的“乱世英雄”。他们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拉帮结派，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挑动武斗，制造事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还明里暗里向党、同人民叫嚣干。其中一些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敌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造大好形势，排挤中央领导同志，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夺回他们失去的“帮天下”。本刊这一期所披露的以张三益等“四人帮”残余势力，即“三种人”为骨干的“中华民族联合阵线”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一个佐证。

这个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采取秘密串联的方式，网罗死党和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诡秘，令人发指！他们散布大量反革命言论，造谣诬蔑反革命传单，以蛊惑人心。他们策划抢劫枪支弹药，搞“镇压”，搞“大震动”，并狂妄地叫嚣：“要把江青弄出来当骨干”，“彻底推翻”现政权，建立新政权。反革命气焰何其嚣张！

这个“中华民族联合阵线”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三种人”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是党内最不安定，最危险的因素。因此，全面否定“文革”，彻底清理“三种人”，就成了这次整党，纯洁党的队伍的关键。不消除“三种人”，他们就会在适当时机重新跳出来，为非作歹，继续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消除“三种人”，就不能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不清理“三种人”，就难以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难以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我们放松警惕，让“三种人”混进“第三梯队”，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就会贻害无穷。

薄一波同志最近强调指出，在清理“三种人”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清理“三种人”这件关系重大的工作，充分利用当前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克服各种干扰，克服软弱无力现象，冲破各种阻力，有重点、分步骤地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三种人”彻底清理出来，以确保整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昔日“文革”英雄 今日阶下囚徒

我省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本刊通讯员张连兴

本刊记者 王国庆

最近，我省破获了以“四人帮”残余分子为骨干，即以“三种人”为主要成员的重大反革命集团“中华民族联合阵线”。这个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采取秘密串联的方式，网罗“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和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藐视和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恶毒诽谤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制定他们的党纲、国策，策划筹集活动经费，阴谋印发反革命传单，密谋抢劫枪支弹药，妄图“亮牌子”、“搞大震动”，扬言“要把江青弄出来领着干”，“彻底推翻”现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这件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的大案，清楚地告诉我们：“三种人”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是党内最不安定、最危险的因素。不把他们彻底清理出来，必然会留下可怕的隐患。

今年七月，周口、洛阳、平顶山地、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召开宣

判大会，判处以张三益为首的“中华民族联合阵线”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八名罪犯一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有力地打击了这帮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一、“三种人”确实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

被判刑的十八名罪犯中，“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就有十三人，其中有原县级党员干部六人。首犯张三益，原周口地区邮电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革”中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得到赏识，由机要员提拔为局领导。七七年因奸污妇女被免职、开除党籍，主犯李济川“文革”中国造反有功，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地委委员、县委第一书记。一九七八年因“文革”中错误严重被免职，主犯王廷彦、韩振文因造反得力都被提拔当过县委副书记，主犯任延庆在“文革”中曾任河南最大的造反组织“二七公社”作战部部长、郑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临汝县委常委。主犯邱连庆，曾任“二七公社”周口市蔬菜联委服务员。上述几名主

案或逃。在判刑“四人帮”后都被免职，受到了应有的处分。但他们不思悔改，仍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进而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秘密串联，组织反革命集团，发展反革命成员。

首犯张三益被免职后，对现实产生不满，便进行反革命串联活动。他与邱连庆、赵拱范（反革命组织“世同党”主犯，已另案处理）、任延庆、李济川等人一起，散布反动言论，歪曲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和中央领导同志。采取表形势、暗藏反对封建迷信活动等手段，利用“世同党”的形式和串联联系的办法，积极培养反革命势力，组织反革命集团。

一九八〇年秋，张三益在和邱连庆串联的基础上，到项城县李济川处，分析形势，两人密谋要作几个准备：一是象过去路线斗争那样，通过路线斗争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就来串联联系，多联络人，一旦上边有人干，就积极响应。张三益回到周口后，就积极进行反革命串联。他和邱连庆一起去汝找任延庆等，给他们讲了与李济川谈话的内容，并煽动说：“我们这些人，怎么样都没有好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由他们干，必须把他们的国家机器砸碎，建立一个新政权。”

一九八〇年八月，张三益等到唐庄任伯家，商讨了发展反革命成员、推翻现政权并在唐庄召开反

革命会议等事项。

张三益、赵拱范、邱连庆等人纠合在一起组织反革命集团。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张三益又到平顶山发展反革命成员。

一九八三年三月，任延庆到周口同张三益、王廷彦、田好强等进行阴谋活动。任说“洛阳地处伏牛山区，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全区基本有了核心，形成了拳头。”“临汝是我工作十多年的地方，是块根据地。”任还建议“今年暑假时，在少林寺开个各地区代表会”，并提出当前要“暗地活动，先找人员，发展组织”。

三、召开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确定反革命核心，散布反革命言论。

这个反革命集团从舆论到形成先后召开反革命会议十七次，制定了反革命纲领，确定了反革命集团核心，散布了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并多次进行密谋策划，搞破坏行动。

一九八二年十月，邱连庆、赵拱范、赵春之（反革命组织“世同党”主犯，已另案处理）等人开会，讨论了反革命纲领的内容。邱提出：既不走毛主席的路线，也不走国民党的路线。赵拱范说：走咱自己的路线。赵春之说：打倒马列主义的叛逆者。邱又提出组织名称叫“民族救国统一战线。”赵说叫“世同党”，党旗用斧子和铁锤交叉组成，表示打倒旧政权，开劈新天地，建立新国家。会上还确定了核心由七人组成，张三益“任大

旗”。赵洪范协助张三益工作。邱连庆、陈学顺负责组织、武装和经费。下设办公厅（秘书处），由赵春之等负责。事后，由赵春之草拟了反革命纲领《民族救国联合战时纲领草案》和《世同党章程草案》，内容极为反动，声称要“打倒马列主义的叛逆者”，“为达到世界大同而奋斗”，污蔑我们“工厂倒闭，工人解雇，无工做，无饭吃，无衣穿。”纲领草案成后，他们又开会商议。邱连庆说：“为了扩大影响，对他们（指政府）震动一下，三益和我研究过几次，决定搞‘飘’（即反革命传单）。”一九八三年元月，张三益在平顶山市郊薛庄自己的家里，召集任廷庆、邱连庆等人开会，又研究了组织名称、旗帜、对外联络、“震动”等问题。任廷庆提出：枪支不要搞长的，要搞短的，经济问题，不论是抢私人的，还是国营供销社、银行的都要慎重。搞“震动”，把已形成的那两个文件修改一下，变成传单，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大城市去散发，在国内外国造成巨大影响。他认为搞镇压震动性更大，提出要经过研究，选准“作恶多端”的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县长，一个县镇压一个，再搞点文字说明，以便扩大影响。八三年二月初，张从平顶山回到口后，又召集邱连庆、田野鑫等讨论修改纲领，决定让田把反革命纲领修改好。田拿着材料找王廷彦修改，搞出了第二章的《中华民族解放阵线

章程草案》，后接任廷彦改为《中华民族联合阵线章程草案》，并修改多处，成了有总纲和三章十三条的反革命纲领。内容极为反动，它恶毒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已处在危急之中，要团结起来，继续推翻×××暴政。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立各级政权。”确定了加入组织的条件，制定了组织纪律和组织机构形式，绘制了“中华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图案，旗帜是长宽比为三比二的红色大旗，中间为黄色大矩形的中国地图。

一九八三年五月上旬，张三益又召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开会，要图借能克之机，进行鼓噪。张三益要利用下半年组织，起草个章程，以叫嚣在整党中“受打击，下了台”的人。王廷彦说：“这是个好机会。一个体制改革，一个整党，一国人肯定会受打击的，我们想写一份《告全党同志书》，在适当的时候搞出去，要用‘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田野鑫说：“我的意见是要搞成大搞，在上海、北京、天津、郑州等地同时搞出，在全国震动一下子。”

搞大搞必有责。搞非成愿，不可一世的领袖、亿万反革命集团都避免不了折戟沉沙、全军覆没的命运。几个搞搞的“三帮人”，在形变大肆的今天，还知道说了历史的教训吗？

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 加强纪律 纯洁组织

邵振业等包庇重用“三种人”受到党纪处分

编者按：清理“三种人”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南阳地委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严肃认真的。当前，一些单位检查“三种人”的工作，之所以进展迟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思想麻痹，软弱无力。有的领导同志甚至对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袒护、包庇。有些单位至今仍有派性干扰。这一问题应引起各级党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定要按照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凡发现有包庇纵容“三种人”或干扰检查工作进行的，一定要认真查明情况，严肃处理。

南阳市酒精厂原党委书记邵振业、副书记高法德等，因包庇重用打砸抢分子梁明武，分别受到党纪处分。

梁明武原在民航总局政治部工作，“文革”期间，积极造反，是该单位“飞虎队”（打人队）成员，他曾亲自动手毒打过干部群众十三人，造成五人伤残；在林彪反革命事件中，他又参与刘锦平一伙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五年，梁复员到南阳市酒精厂当工人。一九七八年元月，民航总局将梁明武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事实的材料派人送交酒精厂党委。当时厂党委副书记王强和政治处主任黄学德听了情况介绍，接收了材料，随即向厂党委书记邵振业作了汇报，但并未引起他



们的重视。之后，黄学德就把材料压了起来，直到他调动工作也未办理交接手续，到一九八三年七月，组织上追查时才交了出来。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查阅这些材料后，分管揭批查工作的王德同志，明知梁有严重问题，却还让他搞揭批查专业工作。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邵振业又提名将梁明武提拔为动力车间党支部书记，并且不向党委介绍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而一味说他到厂后“表现较好”。一九七九年十月，该厂又将梁调厂保卫科任副科长。一九八一年七月，南阳市纪委筹备组将民航总局再次转来的关于梁明武所犯错误的调查证明材料转给酒精厂，并要求酒精厂对梁进行调查处理。厂党委副书记高应德收到材料后，向邵作了汇报，并让他和当时的政治处主任尹绍卿看了材料。邵在这之后虽让我找梁谈过话，梁也承认打过人，但仍未引起重视并进行调查处理。直到一九八二年十月，地、市驻厂企业整顿调查组与厂领导研究中层干部时，向邵提出梁在“文革”中打人的问题是否弄清时，邵振业还说：“我了解这个情况，没啥问题。”高应德、尹绍卿对此也没提出异议，反而又将梁明武由保卫科副科长提为科长。由于邵振业等同志的包庇，致使梁明武的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正确处理。

为严肃党纪，教育本人，经中共南阳地委研究决定：给予南阳市酒精厂原党委书记邵振业同志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原党委副书记高应德、王德同志和原政治处主任黄学德同志党内警告处分；原政治处主任尹绍卿同志检查认识较好，不给纪律处分。

对梁明武的问题，在这次清查“三种人”工作中已经彻底查清，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已决定开除其党籍。

（转自省委《整党工作通报》）

【王德同志函】

内黄县是我省一九八三年整党试点单位。在整党后期，由于县外贸局党组成员王党振在“文革”期间问题严重，被劝退出党。但县外贸局长、党组书记梁彦明同志，却丧失党性原则，一再袒护王党振，并且刁难揭发王党振问题的同志，致使王党振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处理。

“文革”期间，王党振带头造反，曾任内黄县后河公社“二七”分部服务员，一九六八年结合为公社革委会常委。同年八月，王亲自参加了组织对立派群众组织头头戴万鑫，还伙同他人一起对我县武吊打，将袁万鑫残酷迫害致死。王还多次主持会议，揪斗迫害干部群

吴兆明包庇“三种人”
打击揭发人被撤销党内职务



清理“三种人” 消除大隐患

本刊评论员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党的生活

昔日“文革”英雄 今日阶下囚徒
我省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本館通說 萬年通說

永隆記 王國成

[illegible]

是甘密日协会，据该协会的大
家，他们告诉我们：“三神人”
是一股很厉害的政治势力，是党内
最不安定、最危险的因素。不然他
们被赶出党来，必然会留下可怕
的隐患。

今年七月，揭陽、惠陽、平遠、
海豐、市中藥人民醫院先後召開宣

同大会。两批以徐三和为首的“中国民族联合阵线”重庆反革命组织案的十八名要犯一至十五早有预谋，有力地打击了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二、“三特人”确实是一般有社会资源势力

我同的同志十六名受审中，“朝人游”的徐金升至少就有十三名。其中有三名是县政协副主席六个人，有两名是干部，徐国江地区区地局市委余金副主任、党的秘书小组书记。“文革”中极为冤屈和痛苦，直至反革命集团的保释后，徐金升才得平反，傅锦文也得以平反，由机械局长转任为副局长。

七七年因政治问题被免职，并调离广西，主理华南“文革”中国造反派有功，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赵超英、王惠书一书记。一九七八年任“文革”中造反派严重违法乱纪，主理王超英、傅锦文因违法乱纪而被撤去县委书记职务，主理任任在“文革”中曾任河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七二会社”作旅部部长，原籍大学要委副主任，担任其妻李秀，主理陈淑珍，曾任“七二会社”河口镇镇派来受服务员，主理沈为民

行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法律服务。

为了适应教育法制建设的需要,经省委宣传部批准,河南省公检法联合主办的《河南法制报》从1984年10月1日起开始试刊,于1985年1月1日正式创刊,在国内发行。《河南法制报》的宗旨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普及法律知识,为法制建设服务,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争取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服务。(李伟稿)

【“四人帮”残余分子张三益、邱连庆、任延庆等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 周口地区、洛阳地区、平顶山市三个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于1984年7月5日、7月10日、7月19日,分别在周口市、临汝县和平顶山市开庭审理了张三益、邱连庆、任延庆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中华民族联合阵线”一案。对主犯张三益、邱连庆、任延庆各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邱连庆还犯有窝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对其余15名罪犯也分别判处了刑。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主要成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帮派思想极为严重的分子,以及少数不满现实的分子。主犯张三益,男,51岁,平顶山市人,原系周口地区邮电局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当上了该局革委会副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7年因道德败坏被免职,开除党籍。张犯受处分后,继续坚持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立场,常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后因长期旷工被除名的原周口市一砖厂工人邱连庆(男,47岁,周口市人)在一起,发泄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1979年,张犯通过邱犯与项城县赵洪范(另案处理)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世同党”纠合在一起,并向该集团成员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张、邱二犯还四出勾连“有影响”的帮派人物,扩大反革命势力。1981年夏,张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被免职的原项城县委第一书记李济川的介绍,串到临

汝县与任延庆(男,39岁,商水县人)接头。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喧嚣一时的造反派头目,因打砸抢“有功”当上了郑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郑州市革委会常委,毕业后又先后任临汝县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骑岭公社党委副书记等职。1976年因打砸抢罪被拘留,后从宽免于刑事处罚。而任犯不但不知宽而感,反而处心积虑地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带天下”。当他得知张犯在周口的罪恶行径后,便积极参加其反革命活动。张、邱、任三犯分别在周口、平顶山和临汝秘密进行反革命串连,先后聚集了曾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窃据要职,粉碎“四人帮”后受过各种处分、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李济川、田好振、王廷彦、韩振文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打死人命的陈学顺(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其他不满现实的分子共22人,组成了反革命集团“中华民族联合阵线”。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张三益、邱连庆、任延庆的组织指挥下,制定了反革命纲领“中华民族联合阵线章程草案”,确定了领导核心、组织纪律和旗帜,多次密谋策划反革命活动经费,策划散发反革命传单,阴谋搞武器进行暗杀等反革命勾当。还先后在商水县、周口市、平顶山市进行反革命集会17次。他们在反革命集会和反革命纲领中,恶毒攻击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肆意诽谤、辱骂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狂妄叫嚣“要推翻中国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立各级政权”。任犯在1983年春节后的一次反革命集会上,还提出1983年暑假在嵩山脚下召开反革命会议,准备把全省的反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大量事实证明,以张三益、邱连庆、任延庆为主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联合阵线”,是一个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张三益、邱连庆、任延庆等罪犯,是一伙顽固坚持林彪、“四人帮”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最危险的反革命分子。

(省法院办公室)

【故意伤害、强奸、流氓犯赵国煌被处决】 赵国煌,男,25岁,汉

族,河南省汝县人,捕前系鹤壁市团市委青工部部长。

赵犯从1981年至1983年6月,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残害其妻丁艳芳,情节特别恶劣。1983年2月28日晚,赵犯把丁从床上拉起,用裤包线捆住了丁的双手腕,把丁赤身悬吊在屋门上,用针刺丁的胸、腹部。又将丁的双脚绑到窗台上,用烟头烧丁的双脚趾甲,致丁的双手腕部以下指掌关节肌肉萎缩,神经损伤,手指关节呈鸡爪形。丁数月生活不能自理,两手腕神经功能造成障碍。1983年5月26日下午2时许,赵以丁艳芳行为不轨为由,将丁的双手绑住说:“叫你尝尝老虎凳的滋味!”遂把丁的双脚绑在条凳上,搬起丁的双脚,往脚腕部垫砖,用帆布腰带抽打,又用照明电线击打丁的胸部和腹部,并往丁的鼻子里灌凉水。赵犯还用钢钎砸、擀面杖打、皮鞭抽等残酷手段,使丁艳芳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赵犯还犯有强奸妇女罪、流氓罪。

根据赵国煌的犯罪事实,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赵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赵国煌执行死刑的命令后,于1984年3月6日,将赵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省法院办公室)

【桐柏县人民检察院破朱运昌特大贪污案】 1984年,桐柏县人民检察院在上级检察机关的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侦破了一起河南省解放以来最大的贪污案。

被告朱运昌,男,现年44岁,河南省桐柏县人。该犯自1977年至1983年8月任安棚、梁楼两个公社财政助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梁楼公社高寨大队现金保管牛汉成等71人,采取伪造付款凭证,收入不记帐,隐匿帐款,销毁帐目凭据,重支、盗取、骗取等手段,先后作案59次,鲸吞河南油田占地补偿费和其他公款47万余元。在办案中,先后从桐柏、唐河、内乡、邓州、开封等41个窝赃点追回赃款45万余元及其他赃物。主犯、同案犯、包庇犯、窝赃犯26人,无一漏网。此案已于1984年7月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赵仲峰)

什么牡丹，冷冷清清，而中州大道则是热闹非凡，每天都上演着文革的戏剧和闹剧。满城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到头来自己也逃不了挨批。满街都是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声嘶力竭地喊着革命、造反的口号。天上有时还飞来飞机，抛洒传单，传递北京来电、中央文革消息，通报谁谁准是大土匪、大汉奸、大恶霸，谁被打倒。我们经常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游行的人群，一车车拉着武斗战士，肩扛钢枪铁矛头，戴柳条帽冲向武斗的战场……

专署大院里，也分成了两大群众组织。一方是各局委的造反派，一方是“专署兵团”。专署兵团里的人是与造反派对着干的，其领导之一是专署劳动处处长（后称劳动局）李峰。李峰是山西晋北宁武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青岛解放军部队任团长，他没有历史问题，也不怕什么造反派，就联合各局委思想接近的人大联合成立了专署兵团。造反派一方的头头有专署教育局的干部王庚华、胡倩文，他俩文革开始曾被当作坏头头抓了起来，在专署五楼批斗，由地区公检法宣布逮捕投入监狱。后来中央表态造反派是合法组织，支持以河南二七公社、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组织，他们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王庚华还被结合进了地革委领导班子，任常委，负责宣传部门的工作。而以老干部李峰为领导的专署兵团则成了非法组织，遭到迫害和打击，李峰还躲出去好几个月，被抓回来后遭到毒打。但因李没有历史问题，后将其下放农村，再后来到三门峡河南纺织器材厂任职，粉碎四人帮后从新担任地区劳动局局长职务。

有意思的是，当年河南造反组织的风云人物、“郑大联委”的头头、二号服务员任延庆后来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活动被依法逮捕，由洛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作为一名法警，笔者负责将其提押出看守所，交付法院审判，从而见识了这位河南文革的风云人物。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原郑州市副市长金城，因受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在郑州逝世。郑州为金城召开平反昭雪追悼会。十二月二十一日，原河南省政协常委、郑州大学副校长郭晓荣，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逝世，十二月二十一日，有关单位为他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原河南省副省长侯志瀛、杜孟模，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王毅斋、张仲鲁，原省人委参事室主任郭仲槐等也先后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河南省军区召开平反大会，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李善亭等131名同志平反昭雪。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判处制造“六卅七块”血案的反革命杀人犯李启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启光原系北京航空学院闹派人物，“文化大革命”中窜到郑州，勾结郑州纺织机电学校张宝强、谢思华、董小兵等人，将较办公室秘书吴浩然活活打死，大卅七块，企图毁灭罪证。张、谢、董也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河南省委、省革委召开广播大会，宣布惩处林彪、“四人帮”在河南省的反革命、打砸抢首恶分子申茂功、郐国荣、裴征、李尚谦等人。申茂功，原为郑州国棉六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任省工代会主任，省委常委、中央委员；郐国荣原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裴征，原为省外贸局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任省革委工业组副组长。李尚谦原为省委办公厅公务员，“文化大革命”中任省委副秘书长。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打砸抢首要分子张国芳（前团省委书记），在陕西富县深山的一个破窑洞里抓捕归案。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郑州市中级人民依法公开审判裴德成反革命宣传煽动案。曾任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的耿飚昌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周口、洛阳两地区和平顶山市三个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张三益（原周口地区邮局职工，“文化大革命”中当上局委会副主任）、邱连庆（原周口市一砖厂工人）、任延庆（曾任临汝县常委，“造反派”头头）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中华民族联合战线”案。依法判处反革命罪犯18名。主犯张三益、邱连庆、任延庆各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犯下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也应追缉归案，依法处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目的，疯狂推行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制造迷信。他们还采用摘引片言片语的手法，任意歪曲、肢解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变成了脱离革命实践的僵死教条，又把这种教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不准人们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人们的思想方法、